

LA NOBLESSE D'ÉTAT

◎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



[法] P.布尔迪厄 / 著

国家精英

——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

*LA NOBLESSE
D'ÉTAT*



THE COMMERCIAL PRESS

商务印书馆

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

国 家 精 英

——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

[法] P.布尔迪厄 著

杨亚平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200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法)布尔迪厄著;
杨亚平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
ISBN 7-100-03888-X

I. 国… II. ①布…②杨… III. 高等教育-教育
制度-研究-法国 IV. G649.56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4449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GUÓJIĀ JĪNG YĪNG

国 家 精 英

——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

[法]P. 布尔迪厄 著

杨亚平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民 族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3888-X/C·93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2005 年 7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张 22 3/4 插页 3

印数 5 000 册

定价:37.00 元

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

出版说明

法国思想文化对世界影响极大。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孟德斯鸠法的思想、卢梭的政治理论是建构西方现代思想、政治文化的重要支柱；福科、德里达、德勒兹等人的学说为后现代思想、政治文化奠定了基础。其变古之道，使人心、社会焕然一新。我馆引进西学，开启民智，向来重视移译法国思想文化著作。1906年出版严复译孟德斯鸠《法意》开风气之先，1918年编印《尚志学会丛书》多有辑录。其后新作迭出，百年所译，蔚为大观，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建设裨益良多。我馆过去所译法国著作以古典为重，多以单行本印行。为便于学术界全面了解法国思想文化，现编纂这套《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系统移译当代法国思想家的主要著作。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但凡有助于思想文化建设的著作，无论是现代性的，还是后现代性的，都予列选；学科领域，不限一门，诸如哲学、政治学、史学、宗教学、社会学、人类学，兼收并蓄。希望学术界鼎力襄助，以使本套丛书日臻完善。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00年12月

目 录

序言 社会结构和心智结构	1
--------------	---

第一部分 学业分类形式

第一章 二元论思想及对对立面的妥协	14
◇ 智者的学科	17
◇ 自如的特权	32
◇ 学院式平庸	40
第二章 不认同和象征性暴力	52
◇ 认知机器	56
◇ 同类人的评判和教育伦理	71
◇ 可能德性的空间	82

附录

1 全国中学优等生会考优胜者社会出身的差异(1966-1988)	95
2 选拔和超级选拔	98
3 两篇获奖作文的醒目主题	105
4 四位优胜者	109

2 国家精英

第二部分 圣职授任礼

第一章 精英的产生	114
◇ 英式的压力和法式的压力	132
◇ 象征性封闭	144
◇ 二元性结构	160
第二章 制度化的仪式	170
◇ 为奉献者祝圣	173
◇ 苦行与皈依	186
◇ 是贵族就得行为高尚	192
第三章 能力的不确定性	201
附录 关于预备班和名牌大学生活经历的材料	217

第三部分 名牌大学场域及其变化

第一章 结构的状况	226
◇ 模型	229
◇ 大门和小门	243
◇ 名牌大学的空间: X 状交叉的结构	260
◇ 偏爱的矩阵	274
◇ 位置、习性和立场	291
◇ 群体精神	311
◇ 寻入歧途与误入歧途	317
第二章 结构的历史	325
◇ 结构变量与结构恒量	327

◇ 宫殿里的搏斗 340

◇ 迂回之路与庇护性学校 373

附录

1 庆典话语 402

2 方法 405

3 主要数据 432

4 盲目 444

第四部分 权力场域及其变化

第一章 权力及其再生产 454

 ◇ 权力场域的结构 457

 ◇ 再生产的策略 469

 ◇ 家族的再生产方式 482

 ◇ 带学业成分的再生产方式 495

 ◇ 学校的家庭式管理 507

第二章 权力型学校与支配经济的权力 526

 ◇ 国营企业家和家族企业家 527

 ◇ “资产阶级贵族” 539

 ◇ “精英” 551

 ◇ 进化的意识 562

 ◇ 新贵的特权 576

第三章 权力场域结构的变化 593

附录

1 1972 年的经济权力场域(问卷分析) 599

4 国家精英

- 2 权力场域中的位置与政治立场 623
- 3 关系人物平凡的一天 635
- 4 有选择的一致性,制度化的关系和信息流通 642
- 5 昂布华兹·鲁“拆除里布炸弹” 659

第五部分 国家权力与支配国家的权力

- ◇ 国家的魔法 667
 - ◇ 王朝议员与国家谎言 673
 - ◇ 合法化环节的延长 685
- 索引 699
- 译后记 713

序言 社会结构和心智结构

正如人们通常所想象的,社会学的目的在于揭示构成社会空间⁷的不同社会人群的最深层的结构,以及倾向于确保社会空间的再生产或者变革的“机制”。在这一点上,它更接近于心理学,但是,它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心理学或许又非常不同。对客观结构(structures objectives)的这种探索本身就是对认知结构(structures cognitives)的探索,而行动者(agent)在对于具有如此结构的社会世界的实际认识中正是运用这种认知结构:在社会结构和心智结构之间,在社会世界的客观划分(尤其是不同场域中的支配者与被支配者)和行动者划分社会世界的关注原则(principes de vision)与划分原则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

以“结构主义”(structuraliste)和“构成主义”(constructiviste)为特征的两种研究方法,尽管它们在逻辑上不可分割,但是这项研究要求我们要么侧重于探索客观结构(如本书第三部分);要么则相反,侧重于分析行动者的行动和表现中的认知结构,因为正是通过这些行动和表现,行动者建构着社会现实,协调着他们赖以实施相互交流的条件(如本书第一部分^①)。但是,对结构和“机制”的分

^① 前人的一项研究给出了某种最典型的构成主义的研究,而学业分类学的爱好

2 国家精英

- 8 析之所以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和真实的表现力,只是因为这项分析是对行动者(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在进行判断和从事实践活动中所运用的感知图式、评价图式和行动图式进行分析后得出的结果:尽管学校确实让人想起一台巨大的认知机器,这架机器根据学生在前一次分配中的位置,连续不断地再分配着经过它检测的学生,然而,教学机构的分类行动其实只不过是行动者所完成的成千上万次行动以及由此产生的成千上万个效应的集合——他们行动着,就像无数台认知机器,彼此之间既相互独立,但在客观上又配合默契。反过来说,对行动者的建构行为进行分析,即对他们在表现中和实践中实施的建构行动进行分析,都必须重新把握他们表现在这些表现和实践中的认知结构的社会起源,只有这样,这项分析才具有全部的意义。此外,尽管这项分析同样是以主观经验来理解社会的先天形态,但是它仍有别于人种学方法论学家所作的各种类型的本质性分析——他们总是以或多或少经过革新的面孔推出这些东西来迎合时尚:行动者或许建构了社会现实,或许进行了以推行自己观点为目的的斗争和妥协,但是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总是带着自己的观点和利益,带着他们自己的关注原则,而所有这些观点、利益和关注原则又是由他们在这个他们企图改变或

者们时常将它搬出来作为《再生产》(*La reproduction*)的对立面(我由此想起了 A. 西库黑尔[A. Cicourel],想起了他与人合著的 *Language Use and School Performanc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这项研究阐述了教师和学生如何配合默契地接受某一交流的情境,而如果要精确地衡量它的技术效率的话,这种交流情境似乎完全是运作不良的。在这种情境中,教师好像已经得到了所有人的理解,因而避免对理解进行任何形式的检测;学生们自以为全部都懂了,也避免对权威话语的可理解性提出疑问(参见 P. 布尔迪厄, J.-C. Passeron 以及 M. de Saint Martin, 《教学报告与通告》, 巴黎, Mouton 出版社, 1965)。

者维护的世界中所处的位置决定的。在社会关系上建立的偏爱体系(*systèmes de préférences*)的基本结构,是人们选择学校、学科,甚至选择体育运动,选择文化和政治观点的最根本的统一原则,它可以通过某种可认知的关系与社会空间的客观划分联系在一起。以名牌大学的学生为例,在经济资本或文化资本方面,社会空间的客观划分就是在权力场域的两个极点(*pôles*)之间建立起来的。

人类学不是一门社会物理学,但是也不能将它归化为现象学或者符号学。统计学能够帮助我们阐明某些过程,比如说,最终导致对不同社会出身的学生进行差异淘汰的过程,这个过程在错综复杂之中却表现出了如此的规律性,以至于我们真想借助机械论者的暗喻手法来描绘它们。事实上,人类社会的关键问题并不是某些惰性的并且可以互换的物质颗粒,而是可以区分的具有辨别力的行动者——正是他们完成了无以记数的圣职授任(*ordination*)活动,社会秩序正是通过这些活动不断地进行着再生产,不断地进行着变革。不过,这却远不是动机明确的能够产生行动的意识。判断力既是分类行为的根源,也是分类产品的根源,就是说,判断力是实践活动、话语(*discours*)或者各类作品的根源,因而这些活动、话语或者作品都是能够区分的,也是能够分类的。由此说来,判断力并不是意识的理智活动,确切地说,并不是以在按照某一计划建构起来的若干可能性中进行果断选择为目的的某种意识的理智活动,而是惯习(*habitus*)的实践活动,也就是说,判断力是分类与可分类的实践活动的主导图式(*schèmes générateurs*):这些图式在实践中运作,却没有明确的表现;它们是社会空间中的差别位置(*position différentielle*)以习性(*disposition*)的形式混合后形成的产

4 国家精英

物——斯特劳森(Strawson)对社会空间作了确切的定义,即位置的互为外在性。根据遗传学的观点,由于惯习总是与某一位置联系在一起(在结构上也是如此),因而它总是倾向于通过作为惯习混合形式的某些图式来表达构成社会空间的不同的或相互对立的位置空间(如:高的/低的),同时也表达关于这个空间的实际立场(诸如“不论我身居高位还是低位,我都应该坚守我的立场”之类)。通过确认自己在环境面前的自主性(而不是屈从于环境的外在确定性,比如说,物质的外在确定性),并且根据自己的内在确定性,即自然倾向(conatus),惯习使自己得以永存的倾向就是使某一特殊的身份得以永存的倾向。因此,惯习的自然倾向是再生产策略的原则,而再生产策略的目的就在于维持间隔、距离、等级关系,并且在实践中(并非自觉地、有意识地)促进对构成社会秩序的差异体系进行再生产。

因此,社会现实所要求的双重解读包含着与片面的研究方法
10 的双重决裂——只有在对权力进行分析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体会到这些研究方法中的不足之处,而这里所要分析的权力必须是只有在权力的强加者或权力的承受者的积极同谋下才能够运行的权力,比如说,教育体制中的权力^①。只有细致地分析实施象征

^① 我不想重复,因为以下的全部工作都是为了证明:我绝对不同意狭隘地拒绝某种研究方法,有的人组织问卷调查与统计,只用话语分析或者通过直接观察得来的材料说话;而另外一些人则从事所谓基本性质的研究,只关注统计学中极为独特、高度规范化的某一习惯做法,对除此之外的一切都毫不关心。科学社会学的最基本技术足以证明,某些人种方法论学家对社会学家进行的揭露,这些社会学家仅仅以某种方法构想社会科学,而这种方法或许还是美国那里主要的方法,而且这些技术之所以能够产生动员性的效果,那是因为它们使许多社会学家得以将他们自己在知识方面的某些欠

性暴力的机构所具有的客观特性之间的关系,以及象征性暴力所针对的行动者在社会关系上建构起来的习性,我们才能够理解被人们匆匆地认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东西所具有的象征性暴力。事实上,这项有影响的真正的魔法活动(如果不说得那么严重,我们应该说,这项魔法的占有[*possession*]活动)的成功取决于它的承受者也是为了促成它的效能而努力;此外,只有在魔法的承受者通过事先学习具有了认同(*reconnaître*)这项活动的预先倾向的前提下,魔法活动才能够对他产生制约。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一切,象征性效能的奇迹便瓦解了。无论是教师给某一份作业的评语,还是学生对某一所教学机构或者某一学科的偏爱,只有当承受魔法活动的人在个人行为中所采用的感知范畴和行动范畴与教学机构的客观结构迅速达到和谐时,魔法才能够真正起作用,因为教学机构的“意志”和权力正是通过个人行为实现的,而且个人行为中的感知范畴和行动范畴也正是教学机构的客观结构混合在一起的产物。

在整个这部书中,我们将会遇见某些中了魔法的人:是他们构成了教学机构的四个意志,因为他们就是教学机构的化身;不论是被支配者还是霸权者,他们之所以全面地承受或者运用象征暴力,只是因为与他们与之融合在一起,与之化为一体,并且使之得以具体体现。面对不同形式的着魔,科学的任务具有表面上相互矛盾的 11

缺转化为有选择的拒绝;此外,社会学的最基本技术还足以说明,对于方法论学家所建立起来的绝对准确的规则,哪怕只有稍许的违反,都可能招致方法论学家的轻蔑,正是这种轻蔑常常能够掩盖某一实践活动的俗套与平庸——这一实践往往是缺乏想象的,而且几乎丧失了真正严密性所需要的所有真实条件;对于技术与程序的自省性批评。

6 国家精英

双重性:原始倾向认为,不同形式的着魔都是符合常理的,因为它们都处于事物的范围之内;在反对这一原始倾向时,科学必须让人们注意到,它所观察到的各种激情的表现所具有的专断的、无法辩护的,甚至是反常的特性。要做到这一点,科学有时必须求助于(往往)与普通论战中仅仅是幽默的批判混合在一起的具有间隔效果的辩术,这样,它才能够打破对于明证性的教条式信奉^①。但是,建立在幻觉基础之上的某些激情,即在竞技中的投入,都是在惯习和惯习与之对应的场域的关系之中滋生起来的;科学必须对这些激情作出解释,解释它们存在的理由、它们的必然性,并且将它们从错误的荒诞中解救出来——当人们将热情当作自由地进行选择,而这种选择又自愿屈从于权力的蛊惑而自我异化时,激情就会沉溺于荒诞之中。因此,科学废除了“中央集权主义者”的关注与人们称之为“自发主义者”的关注之间的过于简单的更替——这种“中央集权主义”存在于具有最高的象征性强制权的“意识形态机器”中,它是所有行为、所有异化表现的根源;而“自发主义”作为

^① 在所有用来抵制科学分析的策略中,最可靠的策略就是通过将有距离的(*distancie*)描绘还原为日常生活中的“批评”,甚至变为讥讽和流言蜚语,以便达到摧毁整个客观化的尝试的目的,而这些描绘,由于它们要进行信念的悬置(也就是说,悬置自然态度的教条信念),所以它们必定被认为无足重要,或者遭人的嘲讽。实践活动和客观化的教学机构都有其必然性,为了传递这种必然性所做的努力完全有可能受到误解(当它由于前期的逆向误差[*erreur inverse*],比如说,由于典型的功能主义者的合法性尝试,而没有得到不折不扣的理解的时候),因而对描绘进行还原就显得更加容易,更加有可能。当科学在论述像大学场域和智性场域(*champs intellectuel*)这样的社会空间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极其尖锐地摆在了它的面前,因为像这样的社会空间都是以宣称自身垄断了客观化为特征的,而且在这些空间中,行动者不断片面化自己的对手,又美化自己的“准客观性”,而且极其擅于构造这样一个“几乎真实”的东西,而这个“几乎真实”的东西就成为拒绝揭示真实的一个最令人震惊的防线。

前者的简单逆转,将非强制的服从原则,有时也称为“自愿接受制约”的原则写进了每一个被支配者的心里,就是说,服从制约、服从命令或者服从权力的诱惑(“权力来自下面”)。

如果有必要重申被支配者总是促成对他们自身的支配,那么¹²同时也应该说明,使他们倾向于这种同谋关系的习性也是一种效应,一种混合了霸权的效应。由此说到同一主题中马克思也说过使“统治者受制于自己的统治”的那些习性。象征性暴力就是这种特殊形式的制约,制约的实施取决于受制约人的主动同谋,以及那些在丧失了以觉醒为基础的某种自由的可能性的情况下作出决定的人的主动同谋;而这里所说的主动同谋,却并不意味着是有意识的自觉自愿的同谋^①。每当客观结构遇见了与之相适应的心智结构,人们所默认为的这种制约必然得以实施。正是在客观结构与作为其产物的认知结构之间的原始同谋关系的基础上,绝对的、即时的服从才得以建立,这种服从就是人们出生所在的人群的教条经验中的服从——那个人群是一个毫不感到惊讶的社会,在那里,一切都被当作不言而喻的事情来感知,因为现有秩序的内在倾向不断地同化某些本能地准备超越这些内在倾向的期待。

我们将会发现,这项分析对于步入了大学场域的行动者也同样有价值,因为那些在关于权力方面,甚至在关于“自愿接受制约”

^① G.德勒兹在他的《意识的提高》(Augmentation de conscience)一文中对自由问题进行了分析(参见 Gilles Deleuze,《褶子,莱布尼茨与巴洛克艺术》[*Le pli, Leibniz et Baroque*],巴黎,Mimuit 出版,1988年,第99-102页)。在此,我通过其他途径佐证了他的观点。矛盾的是,有的人为了把某些分析贬低为“决定论”的,总是企图通过扩大为意识和解释的空间来为那些被分析的对象(比如说,此处的教师)提供自由的可能性。

方面著书立说,并且本能地将自己排除在自己的分析之外的人,就来自于大学场域的行动者中间。当人们的心智结构在客观上与他们小宇宙的社会结构相互协调时(他们的特殊利益就是在这种协调中并且通过这种协调在这个小宇宙中建构起来,并且被倾注于这个小宇宙中的),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才会不自觉地促进作用于他们、作用于他们无意识之上的象征性霸权:由于与将行动者和社会空间的结构联系起来的关系是一样的,因此,建构学业空间¹³的等级制度,比如学科之间、专业之间、教学机构之间的等级制度,也是一个主动性的中介(*médiation active*),尤其是当它们以混合的状态,作为学业空间的生产者或产品的等级化原则进行运作的时候(这些原则在形式上是中立的);通过这个主动性的中介,社会结构客观性中所固有的等级制度得以行动起来。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只要引导实践活动的原则一直处于无意识的状态,一般的存在之间的相互作用就是“以事物为媒介传递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分布结构以及其转化形式的感知原则和评价原则,以无意识评判“主体”的形式存在于评判者与被评判者之间。

因此,教育社会学是知识社会学和权力社会学的一个篇章,而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更不用说它对于权力哲学的社会学意义了。教育社会学远不是那种运用型的末流科学,它不像人们习惯上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一门有益于教学的科学,事实上,教育社会学构成了关于权力和合法性问题的普通人类学的基础:因为它能够引导人们探索负责对社会结构和心智结构进行再生产的“机制”的本原:无论从遗传学上来看,还是从结构上来看,心智结

构都是与社会结构连接在一起的,因而它有助于不认同这些客观结构的真实性,并因此而认同它们的合法性。正如我在其他文论中已经论述的那样^①,由于社会空间的结构,比如说,我们在差异化社会(*sociétés différenciées*)中注意到的社会空间的结构是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这两个基本的分化原则(*principe de différenciation*)的产物,因此,对文化资本分布的再生产起决定性作用,进而又对社会空间结构的再生产起决定作用的教学机构,就成了人们为了垄断霸权位置而进行的争夺的关键。

“救世学校”(Ecole libératrice)^②确实让人们从归属(*ascription*)中获得成就(*achievement*),从已经得到的谋取需要争取的,从出身¹⁴中获取功绩,从世袭和任人唯亲中获取价值和才能。但是为了感知教学机构真正的社会功能,就是说,将这些教学机构作为霸权和使霸权合法化的基础之一来看待,我们就必须抛弃“救世学校”的神话。(决裂并不容易)由于那些应该完成此项使命的文化生产者们是这种合法幻象的最初的受害者,同时也是最初的受益者,所以决裂的实施与推行就更加艰难。只需看一看所有无意识地得益的人在期待文化修复事业时的那份热切就足够了——因为这项事业的惟一的好处只在于麻醉那些陶醉于自己的文化特权的人感到的伤害,而这种伤害是由于他们特殊的爱好被揭示出只不过是建立在平凡的社会基础之上所引起的。

① 参见 P. 布尔迪厄,《区隔》(*La distinction*),《评判的社会考证》(*Critique sociale du jugement*),巴黎,Minuit 出版社,1979 年;以及《社会空间与“阶级”起源》,《社会科学研究学报》(*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第 52-53 期,1984 年 6 月,第 3-14 页。

② 此处指精英学校。